

论北魏都城变迁与孝文帝迁都的原因

付义汉

(山西大同大学 文史学院 历史系,山西 大同 037009)

摘要:鲜卑拓跋政权曾先后在盛乐、平城、洛阳等地建都。孝文帝时,都城从平城迁往洛阳。在迁都问题上,孝文帝与鲜卑贵族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孝文帝通过非常手段使迁都得以实现。但迁都后不久,北魏就开始走向衰落。孝文帝宁可众叛亲离,也要迁都。其原因只有探究孝文帝的所说所为和复杂的内心情感世界才能揭示。

关键词:北魏 孝文帝 都城变迁 迁都

历朝历代,定都迁都,可谓国之大事,都要慎之又慎。孝文帝迁都却很草率,故迁都洛阳后,北魏很快从鼎盛走向衰落和灭亡,这里面不能说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孝文帝为什么要迁都,史家见仁见智,但大多都从自然环境、社会改革、人文历史、向南发展等方面加以论述,很少从孝文帝内心世界加以探究。

一、北魏前期的都城变迁

早在北魏建国前的公元258年,拓跋首领力微在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举行祭天大会,此次大会确立了鲜卑拓跋氏在部落联盟中的世袭大酋长位置,盛乐自然也就成鲜卑拓跋政权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2.赈济。(1)赈谷赈银。如“文帝后六年,夏,大旱,蝗……发仓庾,以赈民”(《汉书·文帝纪》)。《史记·汲郑列传》记载,武帝时“河南贫民伤水旱万余家”,汲黯“发河南仓粟,以赈贫民”。赈谷之外还赈银救济。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南阳一带发生地震,光武帝下诏:“……赐郡中居人压死者棺钱,人三千。……吏人死亡,或在坏垣毁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见钱谷取佣,为寻求之。”这成为后世封建政府最常用的措施。(2)养恤,即收容抚恤。《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置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田,假于犁、牛、种、食,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对流民给予及时的收容和安置。

3.移民就粟。这是汉代常用的方法之一。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关中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汉书·高帝纪》)。《后汉书·章帝纪》载: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这种方法既可以节省一些赈灾经费,又可以借机调剂农业生产和人口分布,为后代统治者所沿用。

四、开始注重社会养老

《汉书·文帝纪》载:“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以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赐物及当粟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巡行,不称者督

公元338年,拓跋什翼犍即位后的第二年,“朝诸大人于参合陂,议欲定都漯源川,连日不决”,^[1]什翼犍母后王氏知道后,表示反对,故定都一事未能实现,仍以盛乐为中心。

拓跋珪复代国后,以盛乐为都。登国二年(公元387年),拓跋珪势力进入平城一带,以平城为南都。皇始元年(公元396年)九月进兵中原,大败后燕后,拓跋珪至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20千米处),“帝至邺,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2]但因种种原因未实现。在拓跋珪返代后,为了便于对新占领的山东地区的统治,在今大同地区一方面进行封建化改革,一方面大力建造当时的平城,将都城从盛乐迁至平城。因此前平城早已是南都,又拓跋珪从中山返回后并未回盛乐,一直活动于平城地区,此次迁都,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非常自然,没有因迁都而引起朝野非议和动乱。

明元帝拓跋嗣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平城一带发生霜旱。太史令王亮等劝明元帝迁都邺城。博士祭酒崔浩与特进周澹反对迁都,对明元帝说:“今国家迁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

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明确规定八十岁以上老人,除“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之外,都是养老的对象;养老标准上,除发放米之外,还加赐肉、酒、帛等物品。同时还对实施措施作了严格的规定,以保证养老诏令的贯彻执行。

《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三十年(公元49年)五月“大水,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鳏、寡、孤、独、笃、贫者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后汉书·明帝纪》中有记载:明帝永平二年(公元60年)诏曰:“有司其存耆耄,恤幼孤,惠鳏寡,称朕意焉……”还连续六次下诏赐:“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这些政策深受民众欢迎。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汉代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制度还比较粗疏,但在当时的历史时期起到了很好的治世作用;其倡立的不少模式和方法也为后代封建统治者所沿用,如重农、修水利、治河、行各种社会救济、完善社会养老等,这些都被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2]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

[3]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

[4]万国鼎.汜胜之书辑释.中华书局,1965.

[5]陈业新.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6]刘厚琴.汉代社会保障体制极其特征.开封大学学报,2004.4.

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都,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处榛林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恒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塵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3]崔浩是太武帝统一北方的第一谋臣。就北魏来说,以平城为都,“威制诸夏”,的确是长久之策。所以明元帝非常赞称崔浩、周澹所言,否定了迁都提议。我认为,崔浩、周澹之言是非常正确的,是治国安邦之长策。明元帝从善如流,真乃一代明君也。

二、孝文帝迁都是通过非常手段实现的

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决定将都城从平城迁至洛阳。孝文帝的此次迁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此次迁都是事前有阻力,事后遭反对,可以说是众叛亲离,使国家元气大伤。

(一)秘密策划迁都。孝文帝迁都前期的谋划与选址等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关于都城的选定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当时选择的地方有两个,即邺城与洛阳,两地各具优势。孝文帝以“邺城非长久之地,石虎倾于前,慕容灭于后,国富主奢,暴成速败”^[4]为由,选择了洛阳。而这一切是孝文帝跟身边的几个汉儒士谋划的,孝文帝在迁都后对这几个人都因赞助迁都有功而加官进爵。在孝文帝借南伐之名谋南迁出发前,鲜卑统治集团的元老贵胄中除任城王澄外其他人均不知道孝文帝此行是要迁都。

(二)借占卜谋迁都。迁都是国之大事,历朝迁都,都是慎之又慎,除逃亡政府外还要经过一定程序,占卜就是其中必要步骤,在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回平城时,太尉拓跋丕就质问孝文帝,迁都这么大的事你占卜否?孝文帝无语应答。事实上,迁都前孝文帝也曾试图通过以南伐的名义占卜来定迁都。但所占不是迁都之卦象,孝文帝想借题发挥引到迁都议题上,但却未能成功。我们通过《魏书》卷19中《任城王传》记载中可窥知当时情况。孝文帝令太常卿王谌占卜,易筮为《革卦》,孝文帝便借题发挥说:“此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卦。”但马上就遭到尚书令、任城王拓跋澄的反驳:革者,更也。是应天顺人,革君臣之命,汤武得之为吉。陛下已有天下多年。按卦征,只能说伐叛,不能说革命。所以,此卦不是全吉。孝文帝遭到反驳,厉声质问:“象云‘大人虎变’,何言不吉也!”拓跋澄说:“陛下龙兴既久,岂可方同虎变!”孝文帝勃然大怒,对拓跋澄说:“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众也!”拓跋澄毫不让步:“社稷诚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参顾问,敢尽愚衷。”孝文帝气得长久无话可说,只好罢议回宫。就事论事,孝文帝所说是强词夺理,汉化程度很高的孝文帝不可能不理解卦意,但他为了想实现通过占卜来达到迁都的意图,只好无理狡辩。但大臣一点都不给他这个皇上留面子的情况却使孝文帝非常难堪。这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在冯太后去世后,当时的孝文帝虽然执政,但其权威性面临极大的挑战。也可能有人会说,这是鲜卑少数民族的遗风。其实不然,此种情况就是在北魏刚建国之初也不曾有,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就曾因大臣对他稍有不尊重的行为而,更何况北魏建国至此已近百年之久,汉化程度已到相当程度,上下尊卑、君臣之礼是国之基本纲常。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孝文帝才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处

境而执意迁都。

(三)以南伐逼迁都。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八月,孝文帝以南伐名义,亲率百万步骑大军抵达洛阳,时恰逢阴雨连绵。孝文帝深知众臣不想继续南行,于是“戎服执鞭,御马而出”,^[5]命大军南进。群臣纷纷叩首马前,请停南伐。大司马、安定王拓跋休,兼左仆射、任城王拓跋澄,汉人李冲等殷勤泣谏。孝文帝乘机提出,不南伐也行,那就迁都洛阳。现在就决定,同意迁都的站到左边,不同意迁都的站到右边,“欲迁者左,不欲者右”^[6]。大司马、安定王拓跋休第一个站到了右边,表示反对迁都。在冯太后听政时因过被削爵免职的前南安王桢看到机会来了就带头站到了左边,“后高祖南伐,桢从至洛阳,及议迁都,首从大计,高祖甚悦”。^[7]拓跋桢这次带头有功,稍后孝文帝复封其为南安王。拓跋桢以后在平城发生动乱时事先知道消息而不向孝文帝报告,事后孝文帝知道后对已故的拓跋桢的尸体进行了报复,从这里可以看出,桢并不是真正赞成迁都,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投机钻营的行为。在孝文帝的威逼下,那些虽不愿意迁都,但更不愿意南伐的大臣相继站到了左边。“旧人怀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8]一个令孝文帝非常荆手的难题,通过非常手段得以解决,孝文帝的迁都意愿得以实现。

正式确定迁都后,当时洛阳是一片废墟,孝文帝命李冲等营建洛阳。李冲建议孝文帝先回平城,待洛阳建成后冉迁都,孝文帝因害怕平城保守势力对自己不利,不回平城,要到邺城办公,而指派任城王拓跋澄先回平城,利用拓跋澄的威望去做说服工作。在拓跋澄到平城后,“众闻迁诏,莫不驚骇”。^[9]在拓跋澄的反复劝说下,这些留在平城的群臣无可奈何,当时只好勉强同意迁都。孝文帝闻后高兴地说:“若非任城,朕事业不得就也。”^[10]太和十八年二月,孝文帝正式发布迁都令。

三、个人因素是孝文帝迁都的主要原因

对于迁都原因,史学界众说纷云,有说平城气候寒冷的;有说平城地处偏僻的;有说为了统一南方的;有说平城距柔然近有被柔然攻掠危险的。其实,这些都是史学界的种种猜想妄说。那么,孝文帝迁都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通过相关史料我们可以分析出,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孝文帝表面上可以对人说:“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崑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11]平城为用武之地,洛阳为帝王之宅,“移风易俗”,“光宅中原”。另一方面是孝文帝不好说也不能对人说的内心世界的复杂情感。我们从史料可以得知,孝文帝是在冯太后近乎虐待的管教下成长的,对冯太后的感情除敬畏之外,内心深处自然是别有一番情感。冯太后虽然去世,但经过冯太后近20年的苦心经营,北魏朝中基本上是冯太后的势力,可谓母权阴魂未散,无形中制约和左右着政局。从任城王拓跋澄和孝文帝的争论情景可窥孝文帝的处境。如何尽快摆脱这种环境和氛围,树立皇权的绝对权威,做一个能按照自己意志有所作为的皇帝,是摆在孝文帝面前的头等大事。所以在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秘密策划的第一件事就是迁都。事实上孝文帝在迁都后留了一批鲜卑元老在代北,杀了一批反对迁都的功勋贵族,提了一批汉儒的措施也确实改变了自己的处境。另外,孝文帝也要改变死后从属陪葬地位。孝文帝在冯太后死

略论梁启超的近代文献观

李 慧

(山东艺术学院 图书馆,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梁启超是文献学概念的最早提出者,确定了近代文献学的基本内涵,即广义的史料学。在提出了广义的文献学的基础上,梁启超在自己的著作中还提出了研究文献的方法,即综合分析法、比较法和因果律。此外,梁启超还总结了在文献研究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要遵循的原则,即及时发现问题、围绕问题搜集资料、辨别资料的真伪、小心求证结论的可信度。梁启超的文献观点和方法是中国近代文献学的发端,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并对后来的郑氏兄弟和文献学科的奠基者张舜徽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梁启超 文献学 研究方法

一、关于“文献学”概念的提出与阐释

梁启超的学术著作不仅涉及哲学、史学、经济、政治、道德、宗教等社会领域,他对文献学的发微和阐释也成为文献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滥觞。“文献学”一词始见于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1](P18)}1923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清初史学之建设”一章中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梁启超的这一观点,“代表了后来许多学者的共同看法”,^{[2](P12)}说明梁启超在现代的文献学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此外,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读书法讲义》、《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儒家哲学》等专著或文章中共20次提到了文献学的概念(其中,“文献学”15次,“文献之学”3次,“文献学问”1次,“文献的学问”1次)。所以说,梁启超是“文献学”概念的最早提出者。

梁启超并没有给“文献学”下精确的定义,但是已确定了“文献学”的基本内涵。他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3](P96)}又在《读书法讲义》中说:“这种学问,我们名之曰‘文献学’——大部分是历史,但比普通所谓历史的范围更广……我们所提倡的国学,什有九属于这个范围。”^{[4](P1355)}梁启超认为,文献学就是广义的史学,属于国学最主要的部分。在梁启超看来,文献学是与德性之学相对而言,除人生哲学外,所有的国学都是文献学。他在《儒家哲学》中也表达了这种观点:“陈、叶的文献经世之学,与阳明的身心性命之学,混合起来,头一个承继的人,便是黄梨洲,前面讲他对于阳明的建设,只算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最大的部分,是文献之学,即史学。”^{[5](P67)}他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进一步解释,文献学就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事业”。^{[6](P116)}综上所述,在梁启超看来,文献学就是“整理国故”的学问,也就是广义的历史研究,与人生哲学一起构成了国学的全部学问,可以说,梁启超的文献学就是指“古籍整理”的学问。整理国故,即所谓的古籍整理,最重要的资源便是史料,在此,梁启超

后的第二年,在平城方山太后陵侧后东北里余处为自己规建寿陵,“有终焉瞻望之志”。冯太后的永固陵墓冢座北朝南,基底呈方形,长、宽均逾百米,高20余米。孝文帝的寿宫基底也为方形,长、宽约为60米,高10余米。两者相比,一大一小,一高一矮,形成鲜明的对照,充分反映了主人当时的尊卑、主从关系。其实,孝文帝并非要“终焉瞻望”,而是为了笼络人心。孝文帝刚迁都洛阳后就马上下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12]然后在洛阳市西北孟津县麻屯镇官庄村界营建陵园,其冢座北朝南,高约35米,径45米。有趣的是在长陵西北侧约百米左右处还建有一座坐北朝南,高约23米,径35米的小冢,此冢是孝文昭皇后高氏。在平城被颠倒了的关系终于被孝文帝在洛阳颠倒过来,死后也可至高无上,而不是从属陪葬。这种复杂的个中情感,孝文帝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也无法和大臣讨论。因此,摆脱母权阴影,改变施政环境,真正伸张皇权,生死唯我独尊可以说是孝文帝迁都的真正原因。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迁都这么大的事孝文帝不通过正常的程序和商量解决,而是要通过欺骗胁迫手段解决,从而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动摇国之根本。耳后,相继发生了因迁都引起的太子拓跋珪欲私自返平城未遂被孝文帝用椒酒毒死,一批鲜卑贵胄、皇亲国戚在平

城发生兵变要另立朝廷而被杀被贬;六镇起义而引起的全国各地多处起义等事件。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但大多限于风俗习惯方面,在政治、经济等关系国计民生根本问题方面却没有丝毫改变。由于孝文帝的改革促使门阀势力台头,门阀士族固有的腐朽、腐败现象迅速在北魏社会特别是统治集团中蔓延,从此一个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民族开始走向下坡。又由于孝文帝和其继承人宣武帝穷兵黩武连续向南用兵,极大地加重了人民负担和社会矛盾,人民反抗和起义不断,致使北魏开始走向衰败与灭亡。这是孝文帝迁都时所始料未及和不愿看到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魏书(卷1).序纪第一.
- [2]魏书(卷2).太祖纪第二.
- [3]魏书(卷35).崔浩传.
- [4]太平环宇记(卷55).河北道.
- [5][6][7]魏书(卷41).李冲传.
- [8]魏书(卷19下)景穆十二王·南安王传.
- [9][10][11]魏书(卷19中).景穆十二王·任城王澄传.
- [12]魏书(卷7).高祖纪.